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考述

王永波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72)

摘要: 今存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自清迄今的版本目录学家多误以为是南宋中期刻本。根据宋人的各种文献记载考察入手,再结合鉴定古籍版本所使用的避讳等方法,进行多重论证得出宋蜀刻本的刻印时间应该在北宋中叶即宋英宗时期。唐代王士源编定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本是宋蜀刻本的祖本,但它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王士源本的原来面目。宋人刘辰翁对宋蜀刻本进行批点后,在明代广为流传,先后有顾道洪、李梦阳、袁宏道、毛晋等人批评、参校的多种刻本出现,显示出宋蜀刻本的版本价值。

关键词: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 版本; 考述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79(2015)02 - 0054 - 06

On the Carving Copy of *Collection of Poems by MENG Haoran* Publish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in Sichuan Province

WANG Yongbo
(Litera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undong, Sichuan 610072,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rved three volumes of the carving copy of *Collection of Poems by MENG Haoran* publish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have been mistaken as copies published in the middle of the South Song Dynasty by most bibliographers since the Qing Dynasty. Based on all kinds of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all methods such as taboo to identify ancient books,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e that the carving copy of *Collection of Poems by MENG Haoran* should be published in the middl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at is, during the reign of Song Yingzong. The three volumes of *Collection of Poems by MENG Haoran* edited by WANG Shiyuan in the Tang Dynasty is the original copy of this carving copy. But it changed a lot during the process of spreading and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original. Criticized and corrected by LIU Chenweng in the Song Dynasty, it was popular in the Ming Dynasty. After that, there were many scholars criticized and corrected it, such as GU Daohong, LI Mengyang, YUAN Hongdao, MAO Jin, etc., which showed the value of the carving copy of *Collection of Poems by MENG Haoran* publish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carving copy of *Collection of Poems by MENG Haoran* publishe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Collection of Poems by MENG Haoran*; edition; research

南北宋之际直至南宋中期,在今四川眉山、成都地区曾刻印过多种唐人诗文集。名称在后世文献中多有记载,种类多达六十种,世称宋蜀刻本《唐六十家集》,在中国版刻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套《唐

收稿日期: 2014 - 12 - 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唐代郎官与文学研究"(编号: 13BZW061)
作者简介: 王永波(1972 -),男,湖北天门人,文学博士,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唐诗学、目录版本学。

六十家集》在板式上有多种，而且时间跨度长，前后经历了近两百年，因此不是一时一地一家刻书机构所能完成的。它从北宋开始刊刻，直到南宋中期始告完成，应该是多家刻书铺逐批刊刻印行，代表了宋代蜀刻本的最高成就。目前可知宋蜀刻本唐人集有三种系统，分别为十一行本、十二行本、十行本系统，《孟浩然诗集》即属于十二行本。今存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本，钤有“翰林国史院官书”长方印，曾为元、明时期官署所藏。入清后分别经由著名藏书家黄丕烈、汪士钟、杨绍和、潘宗周、李盛铎收藏，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此书在古今书目及论著中多有谬误，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还其本来面目。

一

要弄清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的刊刻与流传状况，必先了解《孟浩然诗集》在唐五代时期的编集与流传。《新唐书》卷六十六《艺文志》四著录《孟浩然诗集》三卷，注曰：“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皆三卷也。士源别为七类。”[1](p1609)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卷首有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云：“浩然凡所属缀，就辄毁弃，无复编录，常自叹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乡里构彩，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获。既无他士，为之传次，遂使海内衣冠缙绅，经襄阳思睹其文，盖有不备见而去，惜哉！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别为士类，分上中下卷。诗或缺未成，而思清美，及他人酬赠，咸录次而不弃也。”[2](p2) 又有韦滔《重序》云：“天宝中，忽获《浩然文集》，乃士源撰，为之序传，词理卓绝，吟讽忘疲，书写不一，纸墨薄弱。昔虞坂之上，逸驾与驽骀俱疲；吴灶之中，孤桐与樵苏共爨。遇伯乐与伯喈，遂腾声于千古。此诗若不遇王君，乃十数张故纸耳。然则王君之清鉴，岂减孙蔡而已哉。予今缮写，增其条目，复士源之清才，敢自述于卷首。谨将此本，送上秘府，庶久而不泯，传芳无穷。天宝九载正月初三日，特进行太常卿礼仪使集贤院修撰上柱国沛国郡开国公韦滔叙。”[3](p434) 从上述三条材料中可以得知，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孟浩然在襄阳去世后，他的好友王士源即开始收集孟浩然的诗篇。天宝四载(745)王士源把收集到的孟诗整理成册，分为三卷，收诗歌二百一十八首。天宝九载(750)韦滔得到王士源的钞本，感到“书写不一，纸墨薄弱”，于是重加缮写，增其条目，而且将之送到秘府。故王士源与韦滔对于孟诗的整理之功不可磨灭。

王士源整理的孟浩然诗集，宋蜀刻本序中说是“别为士类，分上中下卷”，这里的“士类”当为“七类”之刊误，盖二字形近也，《新唐书·艺文志》已经纠正为“七类”。同时，孟浩然弟孟洗然也编集了一个三卷本的《孟浩然诗集》，只不过这个本子没有分类。根据《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王士源、孟洗然分别编集的《孟浩然诗集》三卷本在宋代都有过刊刻，但在编刻流传的过程中，书名、篇目与篇数都出现了细微变化。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孟襄阳集》三卷，唐进士孟浩然撰。宜城王士源序之。凡二百十八首，分为七类，太长卿韦滔为之重序。”[4](p558)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七著录《孟浩然诗》一卷，并作解题云：“所著诗二百一十首。宜城处士王士源序次为三卷，今并为一，又有天宝中韦滔序。”[5](p847) 陈振孙、晁公武分别所记的两种《孟浩然诗集》，在书目、卷数与篇数上都有区别。《孟襄阳集》三卷即王士源整理的《孟浩然诗集》三卷，内容、序记、诗篇数目均吻合。《孟浩然诗》一卷从晁公武的著录来看，应该也是王士源本的翻刻本，本来为三卷，晁公武合并为一卷。这说明在宋代，王士源本起码有两种不同的刻本存在，一为二百一十八首，一为二百一十首。这个收诗二百一十首的宋刻本明末藏书家毛晋曾收藏过，其《汲古阁书跋》云：“余藏襄阳诗甚多，据者凡三种。一宋刻三卷，逐卷意编，不标类目，共计二百一十首。一元刻刘须溪评者，亦三卷。类分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美人、时节、拾遗凡十条，共计二百三十三首。一弘治间关中刻孟浩然者，卷数与宋元相合，编次互有异同，共计二百一十八首。至近来十二家唐诗及王孟合刻等，或一卷，或两卷，或四卷，诠次寡多，本本淆伪，予悉依宋刻以元本、关中本参之，附以拾遗，共得二百六十六首。”[6](p45) 从数目来看，毛晋所藏宋刻本孟集，就是晁公武著录的这个本子。

然而今存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所收诗为二百一十五首，上卷八十五首，中卷六十六首，下卷六十四首，但中卷收张子容《送孟六归襄阳二首》、下卷收王维《忆孟六》以及王迥《白云先生迥歌曰》共四首，这样的话实际收录孟浩然诗二百一十一首。这个数字与陈振孙、晁公武所记宋刻本的篇目都不同，合理的解释是王士源本在宋代曾有过多种重刊本，而且各有源流。如此看来，王士源整理的《孟浩然诗集》三卷本在宋代起码有三种诗篇数目不同的刻本，目前能见到的宋刻本仅剩下宋蜀刻本《孟浩然

诗集》三卷本。至于《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孟洗然编次《孟浩然诗集》三卷本,从宋迄今所有公私书目都无记载,既无序跋文字也无原刻翻刻残本存留,因而显得神秘莫测,极有可能是孤例。

二

据王士源本承传下来的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已经不是王本最初的面目,这可从两者所收诗篇数目不同可以看出,宋蜀刻本有少许的改动。那么,宋蜀刻本的刊刻时代又在何时呢?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卷七云:"至于此刻为南宋初刻,类此版式,唐人文集不下数十种。"[7](p386) 赵万里先生在《中国版刻图录》中说:"传世蜀本唐人集有两个系统。一为十一行本,约刻于南北宋之际,今存《骆宾王》、《李太白》、《王摩诘》三集。一为十二行本,约刻于南宋中叶。"[8](p245) 他认为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刊刻在南宋中叶时期。现存的宋蜀刻本唐人集二十三种曾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影印出版,其《影印说明》延续了赵万里先生的意见,也认为《孟浩然诗集》刊刻于南宋中叶。朱迎平《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论述蜀刻本唐人集时也认为:"至南宋中期,蜀地又有一套十二行本唐人文集诞生,均为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避讳均至光宗惇字。"[9](p169) 如此看来,从黄丕烈到赵万里直至当今学术界,对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的刊刻年代基本上定在南宋初期或中期。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值得进行探讨。

除了前引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著录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外,在宋代记录宋蜀刻本的尚有王楙《野客丛书》及周紫芝《太仓稊米集》,这些讯息可以进一步探索《孟浩然诗集》的刊刻时间。王楙《野客丛书》卷五:"仆尝取《唐六十家诗集》观之,其为牡丹作者几半,仆不暇缕数,且以《刘禹锡集》观之,有数篇。"[10](p47) 王楙多次在书中提及唐人诗文集,有些集子现在还存留下来,如《骆宾王集》、《刘禹锡集》、《姚合集》等,有些则佚失,如《司空文明集》、《杨巨源集》、《沈亚之集》等。虽然王楙没有提及《孟浩然诗集》,但因《孟浩然诗集》与上述各本同属于《唐六十家诗集》,从中也可得到当时的流传讯息。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三十八《曹度坚待制罢帅成都归江南以川中〈唐六十家诗〉见遗作长句为谢》一诗,诗题中明确提到《唐六十家诗》,而且表明是川中刻。诗曰:"三月瞿塘峻江水,万里归来蜀都帅。尽收五十四州书,画舸连樯当歌吹。有唐文士几千人,文不逮汉诗则异。开元天宝光焰长,长庆元和殿唐季。化入宝奁脂泽中,亦有丰满有能事。六十余家三百年,天遣遗风未全坠。青衫昔日同舍郎,老傍人间百无意。将焚笔砚技辄痒,未说风骚心复醉。公堂许我能篇章,遗以斯文慰憔悴。"[11](p266) 周紫芝的这首诗透露出来的讯息很重要,蜀刻本《唐六十家诗》很可能不止六十家,而是"六十余家",盖丛书取成数而言。这六十家唐人诗集从时间上跨越整个唐代,三百年正好是初唐到晚唐,所以六十家很能代表唐诗的突出成就与创作风貌。据赵望秦《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一文的考证,认为"曹筠得到蜀刻本《唐六十家诗》的时间不会晚于绍兴三十三年,则其刻印时间应该更早于是显而易见的"。[12] 但作者认为曹筠从四川地区带出来的《唐六十家诗》是十一行系统,不包含《孟浩然诗集》三卷,对此我们可以稍作辨析。

现存宋蜀刻本《唐六十家诗集》在版式上有十行、十一行、十二行三种系统,究竟哪一种算是《唐六十家诗集》,学术界目前还有争辩。主流观点认为仅有十二行本才算是,其他版式则不算。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著录唐人集时,多次提到蜀刻本,并且与之进行比较。以卷十六为例子,著录《骆宾王集》十卷,解题云:"又有蜀本,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又著录《李翰林集》三十卷,解题云:"别有蜀刻大小二本,卷数亦同,而首卷专载碑、序,余二十三卷歌诗,而杂著止六卷。"陈氏所见到的蜀刻本《骆宾王集》、《李太白文集》今均存,与记载特点均吻合,但《骆宾王集》与《李太白集》均为十二行本。同卷著录《王右丞集》十卷则为十一行本,其解题云:"建昌本与蜀本次序皆不同,大抵蜀刻《唐六十家集》多异于他处本,而此集编次尤无伦。"[4](p468) 陈振孙在书中明确提出十一行本《王右丞集》是《唐六十家集》,可见在宋人眼里无论是蜀刻十一行,还是十二行本都是属于《唐六十家集》系列的。李明霞《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考辨》一文从宋蜀刻唐人集的版式多样、刊刻年代跨度长这两点出发来考察,认为"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多样,既有十一、十二行本,还有现已不存的版本。据此推测,南宋时,蜀刻《唐六十家集》是四川地区刊刻唐人集的泛称"。[14] 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所存十一行、十二行本的唐人集收入《宋蜀刻唐人集丛刊》出版,也正是这个意思。基于上述观点,则周紫芝诗题所说《唐六十家诗》

自然就包含《孟浩然诗集》三卷本。如此则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的刊行时间可以大致确定在南宋初年即宋高宗绍兴中期。

是不是还可以把刊行时间向前推进呢？黄永年先生在《古籍版本学》中判断这批宋蜀刻本唐人文集“从新刊之类来看，当都是坊刻而非官刻、家刻”。[14](p89) 坊刻本虽不如官刻本那样严格进行避讳，但在刻书时还是要遵循避讳制度。如果从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中找出避讳的特征，就有助于判断这个本子的具体刊刻时间。我们把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所有的北、南宋帝王避讳字通检一遍，发现仅有一例避讳情况，即上卷《夜归鹿门寺》之“鹿门月照开烟树”句中的“树”字缺最后一点，显然是避宋英宗赵曙的讳，但全书出现另外的十五个“树”均不缺笔。而且，上卷《彭蠡湖中望庐山》之“峥嵘当曙空”与下卷《李少府与杨九再来》之“笙歌达曙钟”两句中的“曙”字，均未避讳。北宋其他皇帝的名讳如宋真宗赵恒的“恒”字，在书中出现三次，诗题分别是《书怀贻京邑同好》、《自浔阳泛舟经明海》、《高阳池送朱一》，均未避讳。宋仁宗赵祯避讳字“征”字出现六次，分别出现在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行至汝坟寄卢征君》(此诗连同诗题目录共出现三次)、《白云先生迴歌曰》、《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旧游》，均未避讳。此外，举凡北宋皇帝名讳需要避讳的字如“玄”、“弦”、“镜”、“惊”、“敬”、“胤”、“殷”、“桓”字，多者出现十数次，如“惊”字；少者仅出现一次，如“胤”字，皆未缺笔，也就是没有做到避讳。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名讳的“沟”、“构”字在《孟浩然诗集》中各出现过一次，分别是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之“乡里构彩，不有其半”，以及中卷《晚春卧病寄张八》之“常恐填沟壑”，均不避讳。通检全书，发现比照两宋帝王名讳，诗集中需要避讳字约有七十处之多，但全书仅避讳一处，这在宋蜀刻《唐六十家集》中是极其罕见的现象。由于这个孤例的存在，我们可以将宋蜀刻《孟浩然诗集》的刊刻时间向前推至北宋中叶也就是宋英宗时期。

三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在宋末元初被刘辰翁加以评点，成为孟浩然诗集版刻史上的第一种评点本，也是宋蜀刻本另外一种形式的流传。刘辰翁评点孟诗三卷刊行后，在明代十分流行，先后衍生出多种变本，卷数与篇目都有不同。加上还有李梦阳、袁宏道、顾道洪等人的参与，因而刘评本在版本上显得较为复杂。根据各种书目著录，刘辰翁评点的孟浩然诗书名有两种，一个是《孟浩然诗集》，署宋刘辰翁注或评点，有两卷、三卷、四卷本，一个是《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三卷本，两种书今均有著录。各种版本的刘辰翁评点本，所收孟浩然诗数目均是不同的。最早的版本即根据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所载篇目进行评点与刊刻，因元刻本今不传，无法窥知最初的形态。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卷十四著录一种日本元禄庚午翻刻本，“书分上中下三卷，凡游览五十七首，赠答三十一首，旅行三十首，送别四十首，宴乐十七首，怀思十五首，田园十九首，共二百九首。首题孟浩然诗集卷上，次行题须溪先生批阅”，[15](p221) 这个本子当系日本人翻刻中国元代早期的刘辰翁评本，收孟诗二百零九首，相对于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所收二百一十一首，数目相差不大。而且元禄庚午翻刻本将孟诗分为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七类，颇符合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中所说的“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别为七类，分上中下卷”的实际情况。这个收诗二百零九首的刘评本应该是最早的版本。

顾道洪在万历四年(1576)藻翰斋刻《孟浩然诗集》三卷本《凡例》中说“余家藏孟浩然诗集凡三种，一宋刻本；一元刻本，即刘须溪批点者；一国朝吴下刻本，即高岑王孟等十二家者。暇日集览窗几，参互考订，多见异同。因以宋本为近古，庶鲜失真，乃依之为准则。互有字异者，有句异者，有前后倒置者，有通篇不同者，并于宋本内注元本作某，今本作某，或二本作某，字句亦如之，随所详悉。复照须溪批点增入，以备观览。”[3](p435) 顾道洪注意到宋刻本、元刻本以及明刻本之间的文字异同，力图校勘出一个质量比较高的孟浩然诗集来，而且他所依据的校勘原则是不轻易改动宋刻本的文字。对于各本之间的篇目异同，他接着在《凡例》中写到“是集依宋本上中下卷目录，逐卷随之，意在类编，初不显立名目。上卷计诗八十五首，中卷计诗六十三首，下卷计诗六十二首，共诗二百十首。外有张子容二首，白云先生迴歌一首，二本俱不载，复附入名人怀赠内。元本刘须溪批点者，卷数与宋本相同，编次互有同异，类分标目，凡十条：游览诗五十七首，赠答诗四十三首，旅行诗三十首，送别诗四十首，宴乐诗十六首，怀思诗十五首，田园诗十九首，美人诗七首，时节、拾遗各三首，共二百三十三首，多于宋本二十三首。今本即《盛

唐十二家》之一,诗以体编,分为四卷,计五七言古诗六十八首,五言排律三十七首,五七言律诗一百三十三首,五七言绝句二十五首,共二百六十三首。元本多于宋本二十三首,今本又多于元本三十首,共多于宋本五十三首,另立补遗。又采辑《国秀集》内二首,《文苑英华》内一首,皆诸本所不载者,名为《拾遗》与《补遗》,共为一卷。”

顾道洪的这篇《凡例》对我们研究宋本、元本与明本《孟浩然诗集》之间的编次与卷数以及相互的传承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文献材料。日本翻刻的刘评本收诗二百零九首,而顾道洪见到的元刻刘评本,收孟诗已经增加到二百三十三首,超过了宋蜀刻本二百一十一首的篇数,说明在元代已经开始了对孟浩然诗歌的辑佚工作。顾道洪见到的元刻刘须溪评点本比杨守敬见到的日本翻刻本之祖本,在刊刻时间上要晚些,因为前者收诗已经由宋蜀刻本的七类扩充到了十类,增加了美人诗、时节诗和拾遗诗三类,篇目从二百零九首增加至二百三十三首,而且顾道洪见到的这个元刻本比宋刻本多出二十三首诗。元刻刘辰翁评点本今已失传,见不到原貌,但今传一种明活字本刘辰翁评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二就著录一部《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三卷“明活字印本,九行十九字。分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田园、美人、时节十类。(缪氏艺风堂藏书)”[16](p1012) 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二也著录同一部书。经查,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卷六曾著录“《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三卷,明活字本。有正德元年黎尧卿跋。”[17](p131)

从内容卷次与篇数来讲,顾道洪见到的这个元刻本与毛晋见到的是同一个本子。顾、毛二人刊刻《孟浩然诗集》同根同源,不仅卷数一致,而且所收篇目均同。顾道洪藻翰斋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是以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为底本,参考元刻刘辰翁评点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明吴下《盛唐十二家》本《孟浩然集》四卷而成。此书将刘辰翁评语照录。正集《孟浩然诗集》三卷,收诗二百十首,《补遗》一卷,从元本、今本以及《国秀集》、《文苑英华》辑佚五十六首,共计二百六十六首,为孟集收诗最全之本。书末附有顾道洪辑《襄阳外编》一卷,收录有关孟浩然传记、序跋以及历代名人怀赠孟浩然之作。该书半页十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明末崇祯年间常熟毛晋汲古阁刊刻《五唐人集》,其中有《孟襄阳集》三卷,即以宋蜀刻本为底本,参考元刻刘辰翁评点本、弘治关中刻本,收孟诗二百六十六首。此书半页九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书口下刻“汲古阁”三字。前有王士源序,后有毛晋跋。今顾、毛刻二书均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集部著录。

除了顾道洪校订过刘辰翁评点本外,在明代还有李梦阳、袁宏道分别批、评刘评本刊行。凌蒙初在《孟浩然诗集套印本跋》中说“襄阳诗集,刘须溪先生批校本乃其全者。近更得友人潘景升家所梓行,则复有李空同先生所参评,间相攻驳,亦有删削。盖李崛起关中,雄视千古,故每于格调之间深求之,然亦可以见言诗者一斑。今全录则从刘本,次第则从李本,以李每言若干首为一格,若从刘则李批不协耳。”[3](p437) 凌蒙初刊行的这个《孟浩然诗集》二卷本,是他套印《盛唐四名家集》之一种,题“唐襄阳孟浩然撰、宋庐陵刘辰翁评、明北地李梦阳参”。半页八行十九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于书眉上刻评语。前有王士源序,末有刘辰翁跋、李梦阳跋、李克嗣跋、凌蒙初跋。此书分体编排,上卷收五古、五律,下卷收五律、五排、七律、五绝、七绝,共计收录孟诗二百六十二首,较顾道洪、毛晋本少诗四首。明末另有一种《孟浩然诗集》二卷本,卷端题“宋须溪刘辰翁批点、明石公袁宏道参评”。半页九行十九字,白口,四周单边。卷首有王士源序,次为集评。编排亦为分体,上卷收五古、七古,下卷收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共计收录孟诗二百六十七首,较顾道洪、毛晋本多一首。

上述以元刻刘辰翁评点本为基础,由明代顾道洪、李梦阳、袁宏道等人分别参与校订、批评的《孟浩然诗集》,从源头上来讲,都是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本的变体。虽然这些新本在收录孟诗的篇目上多于宋蜀刻本,但孟诗主体依旧是宋蜀刻本,多出的诗歌在不同时期由多人辑佚而成。对于这些多出宋蜀刻本的诗篇,《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九有评论“此本四卷之数,虽与序合,而诗乃二百六十二首,较原本多四十五首。洪迈《容斋随笔》尝疑其《示孟郊》诗时代不能相及。今考《长安早春》一首,《文苑英华》作张子容,而《同张将军蓟门看灯》一首亦非浩然游迹之所及。则后人窜入者多矣。士源序又称诗或阙逸未成,而制思清美,及他人酬赠,咸次而不弃。而此本无不完之篇,亦无唱和之作。其非原本,尤有明证。”[18](p1283) 明人刻书好大喜功,贪大求全,此于明刻《孟浩然诗集》诚为显例。

此外,在明代以元刻刘辰翁评点本为底本进行翻刻的,尚有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辑《唐百家诗》

本《孟浩然集》三卷。朱警本以元刻《须溪先生批点孟浩然集》三卷本为底本照录不误，在分类、卷数、篇目上与元刻本无异，即与顾道洪《孟浩然诗集参校本凡例》提到的元本为同一部书。不过顾道洪在《凡例》中的说明与朱警本尚有些微不同，“一、顾道洪说游览五十七首，朱警本却分为游览二十六首，览望三十一首，顾道洪看漏了览望这一行类目。二、顾道洪说宴乐十六首，实际上却是十七首，顾道洪漏数了一首，因为 209 首版本的宴乐类也是十七首，所以此一版本的总数是 234，而不是顾道洪所说的 233。”[19] 朱警辑本《孟浩然集》三卷本流传颇广，有多家书目著录。

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三卷本基本上还是大致按照题材进行分类，顾道洪就在《凡例》中指出“是集依宋本上中下卷目录，逐卷随之，意在类编，初不显立名目。”这里的“意在类编”实际上指宋本在内容上还是有编排的，只不过不明显而已。刘辰翁评点本即开始孟集分类，从开始的七类到后来的十类，分类逐步成熟。从明代正德开始，明人编校、选编唐人诗集改为分体本，按照诗歌体裁编排，这种选编分体方式的出现有利于传播与普及唐诗。《孟浩然诗集》也不例外，李梦阳、袁宏道批、评本即是孟浩然集分体本，虽然源出刘辰翁评点本，但也适应了形势的发展，从而得风气之先呈现出新面貌。明代刊刻孟集虽多，但宋蜀刻本《孟浩然诗集》在版本上的校勘价值仍不容忽视。对此，傅增湘在《校蜀本孟浩然集跋》一文中有很好的评价，他说“今以蜀刻校之，分卷既殊，次第迥异，而字句差异乃改不胜改，开卷五序即改订至一百余字。卷中词句最异者如《寻香山堪上人》诗‘谷口闻钟声’一联在‘苔壁饶古意’下，《汉中漾舟》诗‘波影摇妓钗’一联在‘日入须秉烛’下，《家园卧疾》诗末增‘顾予衡茅下’等四联，《登总持浮图》少‘累劫从初地’等二联，《送崔遏》诗三四联与一二联互易。其他文字不同者几于无首无之，多至不可胜计。”[20](p579) 由于宋蜀刻本源出于唐人王士源编订本，在文字上它最符合孟诗本来面目，因而显得格外宝贵，在校勘孟集时它是最可靠的版本依据。

参考文献：
[1] 欧阳修，等. 新唐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2] 徐　鹏. 孟浩然集校注 [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 佟培基. 孟浩然诗集笺注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4]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M]. 徐小蛮，顾美华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校证 [M]. 孙猛校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 毛　晋. 汲古阁书跋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7] 黄丕烈. 尧圃藏书题识 [M]. 余鸣鸿、占旭东点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 赵万里. 中国版刻图录 [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1.
[9] 朱迎平. 宋代刻书产业与文学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0] 王　楙. 野客丛书 [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 周紫芝. 太仓稊米集 [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2] 赵望秦. 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考述 [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3).
[13] 李明霞. 宋蜀刻《唐六十家集》版本考辨 [J]. 四川图书馆学报，2012，(2).
[14] 黄永年. 古籍版本学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15] 杨守敬. 日本访书志 [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16] 傅增湘. 藏园群书经眼录 [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17] 缪荃孙. 艺风藏书记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8] 永　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 [M]. 北京：中华书局，2003.
[19] 吕正惠. 孟浩然诗集的版本问题 [J]. 阅江学刊，2011，(5).
[20] 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张立荣）